

• 华夏英才博士论文文库 •

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

刘立涛 / 著



华文出版社

· 华夏英才博士论文文库 ·

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

刘立涛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旁遮普锡克人问题研究/刘立涛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3

ISBN 7-5075-1127-8

I. 当... II. 刘... III. 民族问题—研究—印度—现代 IV. D735.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09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hwch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hs.com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5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26.00 元

序 论

本论著研究旁遮普危机,说明它的起因和发展源于锡克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危机的实质并非简单的教派分裂活动,而是上述矛盾的总爆发。旁遮普危机能够在一个侧面反映印度民族国家整合政策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印度的现代发展是指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发展的进程,它也是印度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殖民统治下的发展进程自然对它有很大影响。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将这些多元因素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意识和目标追求的轨道上,这就要求进行民族国家的整合。所谓民族国家的整合,就是一个将多民族国家内的不同的族体统一成具有一个共同的民族主体性的认知过程。从大的方面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整合和情感整合;从小的方面看,可以细分为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多方面的整合,所有这些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印度官方关于民族整合的观点是:在“所有相关的集团的同意下,在一个国家中创造一种合适的社会和宗教氛围。在那里,所有的公民——不分宗教差别或者社会地位——都能够过着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并且完全献身于建立一个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强大的、

繁荣的和进取的社会的共同的目标。”^①

独立以后,旁遮普锡克民族与印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引人注目,一直是学者们所探讨的课题。因为它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也是所有多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重大课题。多民族国家只有成功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谈到共同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至于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后果,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非洲某些国家内部发生的长期民族仇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涉及到整个印度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从多个方面对旁遮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人以许多新的启发。从目前对旁遮普危机研究的状况看,学者们对于旁遮普锡克民族问题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旁遮普锡克人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这类著作强调了旁遮普锡克问题的历史因素,而对造成旁遮普悲剧的现实因素缺乏应有的重视。例如两卷本的库什万特·辛格的《锡克历史》。第二种观点,认为锡克人问题是一个宗教文化问题,认为旁遮普的锡克人的教派主义意识占主导地位,危机的产生是锡克人的宗教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强调危机的宗教性的方面。例如拉基尔·A. 卡普尔的《锡克分裂主义:信仰的政治》,它片面地夸大了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没有看到宗教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第三种观点,认为旁遮普的问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它的要求是少数民族的要求。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哈尔曼德·考尔的《旁遮普政治: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作者只注意到了旁遮普政治发展中的地方因素,而忽视了印度政治的总体发展与旁遮普地方发展之间的

^① M.N. 曼萨德:《民族国家整合的官方思想》,《世俗民主制》,新德里,1970年2月。

互动关系。第四种观点强调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是 60 年代中期印度进行的绿色革命的后果,认为在经济变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变动之间具有同步关系,没有认识到经济因素仅仅是旁遮普危机中的一个组成因素。哈尔品德尔·考尔的《印度农业发展的政治后果》就持这种观点。第五种观点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是地方分裂主义行为或者分离主义的行为,是要脱离印度国家,建立锡克人自己的卡利斯坦,它的出现对印度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是一种绝对不可放任的行为。这种看法事实上是将只占锡克人中的极小部分的极端主义分子的行为夸大为整个锡克民族的行为,同时没有看到印度政府在促使极端分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上的巨大作用。也缺乏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争取印度独立的各种势力之间互相利用的政治行为的深刻认识。就是在目前也仍然有不少印度学者仍持这种观点。

论述旁遮普危机的著作虽然很多,然而对旁遮普危机中多元因素作具体分析的并不多,特别是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和发展的角度探讨旁遮普危机的研究更属少见。因此,本书拟从走向现代发展的印度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与旁遮普锡克人的地区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旁遮普危机。笔者在这本著作中,尝试提出这样几个因素并对这几个因素进行分析:一、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适变性。也就是说,多元因素刺激下的锡克民族的文化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锡克人的民族性。二、锡克人在印度独立以前对民族政治的参与,锡克与其他民族主义政党以及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对锡克民族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印度的独立和旁遮普的分治对锡克的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立以后旁遮普政治发展的影响;独立以后,在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印度政府和锡克之间的争议和结果对旁遮普危机的影响。三、印度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及其政

策实施,给旁遮普地方经济带来的经济发展要求与中央政府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以及绿色革命对旁遮普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四、印度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变动对于印度地方政治的影响。通过对造成旁遮普危机的多元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旁遮普危机,事实上暴露出多民族的印度国家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整合政策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是其在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处理失败的必然结果。

目 录

序 论	(1)
-----------	-------

第一章 旁遮普锡克人走向现代发展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英印殖民统治政策与旁遮普	(1)
第二节 锡克民族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	(12)
第三节 民族独立运动和宪政改革中的锡克	(32)
第四节 印巴分治对锡克民族的影响	(45)

第二章 建立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上的冲突

第一节 国大党的语言邦政策和印度的语言邦运动	(60)
第二节 从萨恰尔协定到地区管理协定	(66)
第三节 拯救印地语运动与语言邦鼓动的再起	(96)
第四节 阿卡利党的分裂与语言邦问题的世俗化	(115)
第五节 旁遮普语言邦的最后建立	(125)

第三章 印度的政经危机与阿兰德普尔决议

第一节 印度政局的变化与英迪拉的政治方式	(145)
第二节 政治变动对地方邦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影响	(155)
第三节 语言邦中的政治问题与政治运作	(164)
第四节 绿色革命与旁遮普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189)

第五节	世俗主义观念淡化和锡克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	(198)
第六节	从巴特那决议到阿兰德普尔决议.....	(215)

第四章 旁遮普危机的爆发与民主进程的恢复

第一节	政经发展与国家整合力的下降.....	(225)
第二节	教派主义的勃兴和地方势力的增强.....	(237)
第三节	阿卡利党的分裂与 1980 年印度选举	(244)
第四节	朝野政治派别间的倾轧与旁遮普矛盾的激化.....	(250)
第五节	拉吉夫—朗格瓦尔协定与总统治理的实施.....	(289)
第六节	改革进程的全面启动与旁遮普民主进程的恢复.....	(299)
结 论		(308)
参考文献		(314)

第一章 旁遮普锡克人 走向现代发展的历史背景

现代印度国家的整合是建立在近代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历史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是不存在的,英印殖民政府在印度特别是旁遮普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是大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印度社会经济的变化及文化的复兴等印度社会本身的变化是锡克民族所面对的社会因素。印度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民族的宗教文化复兴、锡克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在民族独立运动和宪政改革两个方面的政治参与、在印度独立印巴分治中的立场,以及上述诸方面对独立以后锡克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英印殖民统治政策与旁遮普

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双重性质

英国殖民者从 18 世纪中叶起通过武力征服和威胁利诱等手段,在日渐腐败的莫卧儿帝国内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逐渐取代了原莫卧儿帝国的地位,最终建立和巩固了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到了 19 世纪末,英国已成为南亚次大陆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从此印度也成了大英帝国王冠上一颗最璀璨宝石。直到 1947 年英国退出次大陆印度独立为止,英国对印度进行了长达近 200 年的殖民统治。这种绵延久长的殖民主义统治结果构成了印度国家现代发展与整合的基础。

总体而言,英国人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作用可以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经典理论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它既有破坏作用也有建设作用。首先它是对印度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架构极度的破坏,其次也将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行为模式传入了印度。

具体地讲,在政治上,英国用其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取代了旧的盛行于次大陆的封建主义统治。一方面,实行以英国利益为中心的政治政策,一切政令的发出都来自于伦敦,印度的政治利益必须完全服从于大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在印度政治制度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形式对印度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面对印度资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殖民统治者不得不逐渐重视印度人的政治要求,让当地人参与对印度的管理,对印度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的要求作出一定的让步,在印度逐步实施宪政改革,实行不完全的省自治,直到最后被迫完全退出印度次大陆。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的宪政制度为独立之后印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提供了长期的政治基础。然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政治上还有一个负面影响,由于英国人的统治是外来殖民的统治,印度的面积和人口都远远超过英国本土,对这样一个大国,英国殖民者要想实行相对稳定的统治,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要在印度各种族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地在印度各民族中制造矛盾。例如它在征兵问题上,把印度的民族人为地分为军事民族和非军事民族。锡克族就是一个军事民族。再就是 20 世纪初,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国大党的自治要求,英印殖民政府便大力扶持伊斯兰教派政治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鼓吹穆斯林的利益与印度教徒的利益是对立的,在立法会议中引入教派单独选区制度,在正常的议会政治中植入教派政治的毒瘤,其危害性不仅仅在于印度独立之日,即是印巴分治之时,以及以后几十年中印巴之间的长期对立,更在于在分裂后的印度国家中教

派政治长期以来仍然对印度的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经济上,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英国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渐压倒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英国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从早期的重商主义摇身一变为自由贸易。为了向海外推销英国的工业品并获得必需的原料,英国将印度变成了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政策都围绕着这一中心在转动,英国对印度的开发都是为了满足英国本土的需要,根本不顾及印度自身的发展利益。英国在印度修筑了庞大的铁路网络,但是这些铁路都是通向各个港口的,而不是与印度各地的内在发展有机地连结起来的。任何有损于英帝国经济利益的行为即使不会被明文禁止,也会遭到百般阻挠。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一方面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相对较快,一方面使资源缺乏的地区经济愈益落后,从而造成各地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同的人群由于英国的经济开发政策而受益不同,与英国殖民开发政策相契合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从中得到了收益,而与英国殖民开发政策不相契合的那部分社会阶层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甚至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国家经济结构的整体上看,也必然是一个畸形的结构框架。因此尽管印度独立时,号称是世界第十大工业国,但是它的经济门类依然残缺不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印度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满足印度迫切进行现代化的要求,印度有必要对经济战略作出新的调整,既要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又要考虑到各地区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方面,英国人到印度之后,遭遇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伊斯兰教是帝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徒主要分布于印度次大陆的东北部(今天的孟加拉国)和西北部(今天的巴基斯坦),而次大陆的其他地区则是印度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到了19世纪,这些印度地方本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

化相比愈显示出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就印度教文化而言,旧式的种姓制度将人们按种姓出身完全分裂开来,整个印度教社会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新的文化冲击面前,印度教的文化人物不仅没有革新自己的文化,反而愈益顽固不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印度与西方的联系日益增多,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到海外留学经商的印度人很多,但是每一个到外国进行留学或经商的印度教徒,一旦离开印度本土,就被认为是受到了不洁的污染,丧失了自己的种姓,回国以后要想重归自己的种姓都必须重新受洗,否则就会被逐出其原来的种姓。这种固步自封的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根本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侵入。起初英国人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笼络印度的旧式文人,还在印度专门开办梵文学院,教授印度的旧学,而不是向印度人传授西方的新学。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巩固,英国人又开始极力贬低印度本土文化,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大批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在印度各地建立起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一部分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印度民族精英的领导下,印度终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复兴运动。既有印度教徒的,也有穆斯林的,当然也有锡克的。印度本土文化的复兴,对于激励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斗争形式,其哲学本质就是来自印度教本源文化。然而,印度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那就是教派主义现象纷呈。各教派之间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相互攻讦,迄无宁日,不仅加深了教派之间的成见,影响了印度各教派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也给印度的政治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教派烙印。这种教派文化的盛行,对于独立后力图奉行世俗主义的印度政府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二、英国对旁遮普的殖民政策及影响

旁遮普地处印度的西北边陲,是英国在印度最后征服的一个地区。在英国完成对旁遮普的征服之前,这个地区是兰吉特·辛格所统治的锡克王国所在地。历史再向前溯,则是锡克反对莫卧儿帝国在旁遮普统治的斗争时期,这种斗争的结果,动摇了旁遮普的种姓制度,推翻了统治这个地区的属于刹帝利种姓的拉吉普特贵族,剥夺了他们通过征收土地赋税对村社土地的控制,瓦解了种姓与土地所有之间的关系。在兰吉特·辛格统治时期,他将大量的土地连同村庄作为封邑分给锡克贵族,实行与莫卧儿帝国相类似的土地分封制度,但并没有改变最底层的土地关系。英国政府接手对旁遮普的统治后,如何在这个地区进行土地整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不仅仅是尽可能地榨取当地的田赋,而且从 19 世纪初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将印度变成英国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要铲除存在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切寄生阶级。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收田赋,并参与土地的经营。在旁遮普特别是旁遮普的东部,柴明达已经很少,所以柴明达不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锡克王国的封建采邑。

当时存在于锡克王国土地上的这些封建采邑大致可分为二种:其一是军事扎吉尔,包括以向国家提供军事服务为条件取得的土地和有功之臣的封地;其二是作为文武官员俸禄的采邑。锡克将领大部分都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争,根据 1843 年 3 月 14 日的投降议定书,参加反英起义的军事首领的扎吉尔全部被没收,每月从英国政府领取固定的最高不超过 300 卢比的生活费。没有参加反英战争的军事将领们也应交出军事扎吉尔,只保留个人的封地,向政府缴纳 25% 的收入,代替以前所应承担的封建义务。同时规定封地只能终身享有,不得世袭。就连曾为英国人立过大功的人,其扎吉尔一般也不允许世袭。例如在旁遮普臭名昭

著的泰贾·辛格(曾任锡克军队的总指挥,在对英战争中通敌,是锡克王国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他尽管保留了每年可收入达 92779 卢比的扎吉尔,但仅有 2 万卢比收入的封地可以传给子孙。据此,用不了多长时间,扎吉尔便会在旁遮普消失。另外锡克官员中愿意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也多以固定年金取代了扎吉尔。不愿或无法为英国政府服务的人大部分交出扎吉尔换取年金。英国政府从各个方面限制扎吉达尔(占有扎吉尔的人)对土地的权利,一再强调扎吉尔不是个人的财产,因而扎吉达尔无权过问土地的经营,扎吉尔内的土地按英国政府规定的土地整理原则进行登记,由官方确定租赋数额。而且扎吉达尔要负担这项工作的费用,扎吉达尔也不能在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在兼并初期,财政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绝对掌握在英国税务长手中,当地的扎吉达尔和他们领地上的农民,一律受税务长的管辖。这些措施的主要结果是,削弱或完全剥夺了扎吉达尔对农村公社的控制,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新的困难,感到入不敷出,久而久之,有些人自动放弃扎吉尔,接受政府的年金。如锡克著名人物萨达尔·勒纳·辛格·马吉尼亚即是典型的事例。旁遮普被兼并初期,赋税比较低,而且还一再降低,开始占产值的 $\frac{1}{3}$,几年后降到 $\frac{1}{6}$ 。1871 年田赋法规定,赋额为地租总额的一半,而同一时期,马德拉斯的田赋约占土地产值的 45%,北印度的田赋占地租总额的 66%,1822 年还曾高达 83%。孟加拉的田赋在 1793 年为地租总额的 90%,后来虽然降低了不少,但是多数农民还要向柴明达尔交租,负担远远超过旁遮普的农民。那时旁遮普的农民很少因欠税而出卖土地,同时政府实收田赋总额却在不断增加。1850—1851 年间为 102 万英镑,到 1856—1857 年度时为 145 万英镑。田赋总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打击封建主那里得到的。

进行土地的整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确定土地所有者即纳税人,按英国的财产观念建立起土地私有制,英国人的上述政策使旁

遮普上层封建势力的力量大为削弱,确立土地私有制使农村的土地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地权,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且还便于政府干预土地的经营,让农民为英帝国的市场需要而生产。客观上讲,这也为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土地所有者的登记很简单,只要村子里的人共同证明一个人多年耕种同一块土地,向政府交税,并且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生产的产品,就可以登记为土地的所有者。在发生争议时,政府的土地整理员有权作出裁决。而这类裁决往往有利于直接耕作者,不直接经营土地的上层所有者,从国库领取津贴,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经过土地整理和登记,虽然政府仍然和整个村庄结算田赋,但是完整的土地私有制却建立起来了。

英国人的土地政策还加强了佃户的地位,早在锡克王国统治时期,旁遮普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贾特人夺取了政权,使得不事生产的高种姓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被削弱了,为了向政府缴纳高额田赋,这些高种姓土地所有者情愿以优越的条件接受低种姓为佃户,或共同所有者,并由后者负责向政府纳赋。锡克王国政府为了保证田赋收入,也限制佃户向土地所有者缴纳过高的地租。佃户的地位改善了,永佃户是锡克王国最有效的纳税人。到英国人进行土地整理时,发现不少佃户几乎成了土地的主人,完全停止向土地所有者纳租,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缴纳少量地租。例如在阿姆利则,锡阿尔科特和古达斯普尔三个县进行土地整理时,共有 168976 户登记为佃农,其中有 60530 为永佃户,这些人中又有 1/3 只纳赋不缴租。英国殖民者统治这一地区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欣然接受这一事实,把他们登记为“没有地租义务的永佃户”。永佃户的登记条件也很松,只要能证明在一块土地上耕种 12 年以上就算永佃户,1854 年,《旁遮普民法》进一步确定了永佃权,规定凡在一个土地整理期内(一般为 20—30 年)登记为永佃户的佃农地租不变,永佃户甚至有权砍树,掘井,围园,这样永佃户对

土地的权限与自耕农相差无几。印度独立后进行土地改革时,旁遮普近 65 万永佃户获得了对 185 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① 这同永佃户长期以来对土地的较大控制权有一定的关系。从经济政策措施方面而论,英国人的土地整理政策使当地的生产关系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阶段。

除了在土地整理方面工作,建立土地私有制外,英国殖民政府还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措施,为了使旁遮普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政府还改善了交通,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而对旁遮普的发展作用最大的措施莫过于进行水利建设,将大量荒地变成肥沃的水浇地。旁遮普地处印度西北,降雨量极少,但是水资源却十分丰富,旁遮普的当地语意就是“五河”之意,发展灌溉是历代王朝都做的大事,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治理下,除了对旧有的一些灌渠进行改造扩建之外,19 世纪后期先后完成了巴里河间地上游灌溉渠(1876 年)、西朱木拿河灌渠(1871 年)、木尔坦工程(1888 年)、切纳布垦区(1892 年),20 世纪又建成了著名的三角工程,从杰卢姆河引水至切纳尔河,然后注入拉维河的运河。这些灌渠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多为可以常年使用的灌溉工程,到了 1905—1906 年度,总灌溉面积达 280 万公顷。对英国殖民者而言,这些灌溉工程的建设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人在运河上投入的前 10 年,光是通过收取水税就捞回了全部投资成本,除了从税收中获取大量的收益外,英国殖民者也在旁遮普的高产中获得收益。英国人在切纳布河,杰卢姆和雅木拿三个移民区的灌渠总投资不过 350 万英镑,1907 年这些垦区的农产品价值即达 600 万英镑。切纳布河下游的垦区每年净征赋税额就达到灌渠成本的 40%,从卡拉奇出口的大麦 1898—1899 年度价值 255 万英镑,1904—1905 年度为 800 万英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庶的

^① M.S. 兰达瓦:《旁遮普的绿色革命》,新德里,1974 年,第 47 页。